

# 论《天问》问旨

李 诚

**内容提要** 《天问》向称难读,但却又是屈原最重要的作品之一。本文通过对《天问》本文的归类、分析,认为《天问》仍如屈原的其他作品,乃一首政治抒情诗。

**关键词** 屈原 天问 错简 抒情诗

《天问》向称难解。两千余年来,说者或董理其错简,或训释其句辞,虽间有论及其问旨者,然多一掠而过,不惶专门论及。那么,司马迁所谓读《天问》等作品而“悲其志”的“志”(即其问旨)到底是什么呢?《天问》中所蕴含的“志”与诗人的其他作品如《离骚》、《九章》等的思想有何内在的联系呢?对《天问》中所蕴含的诗人之“志”的探索,是否更有利于我们从宏观的角度去把握和审视董理错简(如果说真的存在错简)、训释句辞等工作呢?因此本文不揣简陋,就屈赋本文而分析,略论其旨,并兼及其他。乞方家正之。

自王逸在《楚辞章句》中认为《天问》“文义不次”以后,对《天问》原貌的探索,就一直是屈学中受人瞩目的课题。《天问》是否确实存在错简?没有实证,是难以作出最后结论的。不过,这并不妨碍我们在对《天问》问旨加以探讨时,将现存《天问》中的内容按其性质和所涉历史年代略加排列,以把握作者的创作意图。

今本《天问》共374句<sup>[1]</sup>,可以分为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自首至“羿焉彗日,乌焉解羽”,叙天文、地理,共112句;第二部分自“禹之力献功”至“厥严不奉,帝何求”,叙舜至春秋史实,共248句;第三部分自“伏匿穴处”至末尾,叙楚国史,并结以作者殷切的期望“悟过改更,我又何言”,共14句。

如若这个划分尚不大谬,则请进一步讨论其问旨。关于这一点,或许由于屈学与诸多学科交叉渗透,近现代学术界更多地将《天问》视为百科全书式的作品而分别探索其中自然、哲学、神话学、人类学、历史学等内容。尽管这些研究至可宝贵,但是从文学研究的角度,我们却始终不能忽略了,《天问》毕竟是一部文学作品,是一位诗人处于极度愤懑痛苦时心迹的流露。因此,它并不是诗人对万物究竟的好奇探询,而是借对万物之问来表达诗人对历史教训和政治现实的深刻而沉痛的思考。其中虽然天文、地理等内容与历史教训和政治现实并没有直接的联系,但它们在这里实际上也起到了对历史、政治问题的追诘的铺垫作用。这样一种写作意图,恐不必做过细的分

析,仅从全篇的体制安排也不难感受到。唯其如此,故《天问》中几乎包含了春秋以前的全部华夏史传和与这些传说、历史相关的人物,上述三部分第二、三部分占据了整个篇幅的三分之二强,构成了《天问》的主调,即是明证。

那么作者的问旨究竟是什么呢?从哲学思想上看,是对“天命”的存在的怀疑乃至否定;从政治思想上看,则是对其以明君政治和贤人政治思想为核心内容的“美政”的再次肯定和强调。

在古人看来,朝代的嬗递,乃是“天命”的结果。《诗经》反复申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茫茫”;《商颂·玄鸟》“天命降监,下民有严,不僭不滥,不敢怠遑,命于下国,封建厥福”;《商颂·殷武》“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周颂·昊天有成命》)等等,就是这个意思。当然,随着社会的进步,由于朝代更迭中客观反映出来的人心向背所起的巨大作用,春秋以还,“天命观”不断被赋予了新的内容。如《左传》僖公五年引《周书》“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增加了“德”的内容;又如《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引《泰誓》“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孟子·万章》引同书“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增加了“民”的内容。而《天问》的作者屈原则有更为进步的“天命观”。他在《离骚》中说:“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铺”,尚未越过上引《左传》、《孟子》所言藩篱,而在《天问》中却大胆地喊出了“天命反侧,何罚何佑”这样强烈的质疑,充分体现了他哲学思想上的进步<sup>[2]</sup>。这种进步的哲学思想体现于政治思想,必然的结果是强调明君政治与贤人政治思想。我们粗略地统计了一下,在公认的屈原的政治抒情诗《离骚》和《九章》中,从正面歌颂尧、舜、禹、汤、文、武的句子约十二处;从反面抨击启、羿、浇、桀、纣、晋献、夫差的句子约八处,歌颂和抨击的出发点都是以明君政治和贤人政治思想,亦即屈原自诩的“美政”思想为核心的。《天问》所强调的,仍然是这样的旨意,即国祚是否久长,关键并不在“天命”,而在于能否“举贤授能”“循绳墨而不颇”。所不同的,只是在于《天问》之“问”,远远超出了历史和历史事件本身,而及于对天地开辟,万物究竟的追诘,因而较之《离骚》、《九章》等,更富有了哲思和对自然大胆探索的精神与色彩。

既然如上所述,《天问》的中心问旨当可从其第二部分的分析而得其究竟。为了便于说明问题,我们想把《天问》第二部分所涉及的内容按历史顺序分成五段,即舜与鲧史、夏史、商史、西周史、春秋史,将原文抄在下面,以供分析。当然,由于训诂尚不统一的原因,《天问》中许多句子到底应当归属哪个朝代,处于什么次序,是有不同看法的。因此我们在判定其归属和次序时,尽量尊重原文顺序,尽量尊重学术界的成说。为了方便读者与原文比较,凡原来并不相衔接的地方,一律用“○”标示,句子前偶有的阿拉伯数字,是指此句在原本《天问》中的位置,没有标数字的句子,就是原本《天问》中与前句紧相连接的句子。

### 1. 舜鲧史:

185 舜闲在家,父何以鲧。尧不姚告,二女何亲。厥谋在初,何所亿焉。璜台十成,谁所极焉。登立为帝,孰道尚之。女媧有体,<sup>③</sup>孰制匠之。舜服厥弟,终然为害。何肆犬豕,而厥身不危败。○145 阻穷西征,岩何越焉。化为黄熊,巫何活焉。咸播秬黍,莆藿是营。何由并投,而鲧疾修盈。

### 2. 夏史:

113 禹之力献功,降省下土四方。焉得彼涂山女,而通之于台桑。闵妃匹合,厥身是继。胡为嗜不同味,而快鼯饱。启代益作后,卒然离鬻。何启惟忧,而能拘是达。皆归射籍,而无害厥躬。何后益作革,而禹播降。启棘宾商,《九辩》、《九歌》。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地。帝降夷羿,革孽夏民。胡射夫河伯,而妻彼洛嫫。冯珧利决,封豨是射。何献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泥娶纯狐,眩妻爰谋。何羿之射革,而交吞揆之。○169 惟浇在户,何求于嫂。何少康逐犬,

而颠陨厥首。女岐缝裳，而馆同爰止。何颠易厥首，而亲以逢殆。汤谋易旅，何以厚之。覆舟斟寻，何道取之。桀伐蒙山，何所得焉。妹嬉何肆，汤何殛焉。○<sub>205</sub>缘鸩饰玉，后帝是飧。何承谋夏桀，终以天丧。帝乃降观，下逢伊挚。何条放致罚，而黎服大说。

### 3. 殷史：

<sub>213</sub>筒狄在台，譬何宜。玄鸟致贻，女何嘉。该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终弊于有扈，牧夫牛羊。干协时舞，何以怀之。平胁曼肤，何以肥之。有扈牧竖，云何而逢。击床先出，其命何从。恒秉季德，焉得乎朴牛。何往昔班祿，不但还来。昏微遵迹，有狄不宁。何繁鸟萃棘，负子肆情。眩弟并淫，危害厥兄。何变化以作诈，而后嗣逢长。成汤东巡，有莘爰极。何乞彼小臣，而吉妃是得。水滨之木，得彼小子。夫何恶之，媵有莘之妇。汤出重泉，夫何罪尤。不胜心伐帝，夫谁使挑之。○<sub>333</sub>初汤臣挚，后兹承辅。何卒官汤，尊食宗绪。○<sub>285</sub>彼王纣之躬，孰使乱惑。何恶辅弼，谗谄是服。比干何逆，而抑沉之。雷开何顺，而赐封之。何圣人之一德，卒其异方。梅伯受醢，箕子详狂。○<sub>253</sub>会朝争盟，何践吾期。苍鸟群飞，孰使萃之。到击纣躬，叔旦不嘉。何亲揆发，定周之命以咨嗟。授殷天下，其位安施。反成乃亡，其罪伊何。争遣伐器，何以行之。并驱击翼，何以将之。

### 4. 西周史：

<sub>297</sub>稷维元子，帝何竺之。投之于冰上，鸟何燠之。何冯弓挟矢，殊能将之。既惊帝切激，何逢长之，伯昌号衰，秉鞭作牧，何令彻彼岐社，命有殷国。迁藏就岐，何能依。殷有惑妇，何所讯。受赐兹醢，西伯上告。何亲就上帝罚，殷之命以不救。师望在肆，昌何识。鼓刀扬声，后何喜。武发杀殷，何所悒。载尸集战，何所急。○<sub>289</sub>昭后成游，南土爰底。厥利维何，逢彼白雉。穆王巧梅，夫何为周流。环理天下，夫何索求。妖夫曳炫，何号于市。周幽谁诛，焉得乎褒姒。○<sub>329</sub>皇天集命，惟何戒之。受礼天下，又使至代之。

### 5. 春秋史：

<sub>281</sub>天命反侧，何罚何佑。齐桓九会，卒然身杀。○<sub>325</sub>伯林雉经，维其何故。何感天抑坠，夫谁畏惧。○<sub>337</sub>勋阖梦生，少离散亡。何壮武厉，能流厥严。

以上所列凡 208 句。第二部分尚有 40 句未列入上述五段。这 40 句分别是：自第 153 句“白霓婴茀”以下共 16 句；自第 201 句“吴获迄古”以下共 4 句；自第 341 句“彭铿斟雉”以下共 20 句。这些句子其所以未被划入以上五段中的任何一段，是目前研究尚待深入的状况所决定的。与其勉强将其归属于某段，倒还不如暂时置之不顾。好在原书具在，读者自可判断我们下面的结论是否会由此受到影响。

## 二

我们先谈谈“舜鲧史”。

舜的故事在先秦故书所载颇多，综合言之，其情节大约为：舜仁义恭孝而又长期未得婚配，或荐舜于尧，尧遂妻以二女并施诸一系列考验以察其德行。舜之父、弟屡加害于舜，舜终因二妻与女弟（嫫）的帮助而得逃脱，后继尧为帝。《天问》所记，亦大致包括这样一些情节，其中“何肆犬豕”云云虽尚无确诂，但是以这里的整段描写，再参之屈原在其他作品中对舜流露的一贯的感情看，

屈原在这里正是以问句的方式肯定了舜“登立为帝”且不为父、弟所害的事实。

鲧的故事在先秦故书中是存在着不同说法的<sup>[4]</sup>。依《山海经》而言大约为：鲧治水尚未结束，因窃息壤而触怒了“帝”，因而被处死。禹继承父志，治水获得成功。尽管在典型的儒家经典中，鲧被说成“四凶”之一，是因其治水壅塞失败而受到处分的，但是以屈原《离骚》、《九章》、《天问》地理部分所写来看，屈原乃认为鲧、禹治水并无不同，鲧乃刚直犯上而遭处分。准此，则可知洪兴祖《楚辞补注》解释“咸播秬黍，莆藿是营。何由并投，而鲧疾修盈”四句说：“言平水土，民得并种五谷矣，何由鲧恶长满天下乎”，乃是受传统儒家经典制约的结果。屈原是绝不会抱持“鲧恶长满天下”之说的，以洪氏句式，此句正当释为“哪来鲧恶贯满盈(之说)呢”，因而这里屈原实际上是通过疑问的方式否定了“鲧疾修盈”的儒家传统说法，从而肯定了鲧作为一位治水有功的先人而在夏楚民族中享有的被祭祀的崇高地位。

从整部屈赋通观之，舜与鲧似与楚民族有着特别的血缘关系，因而亦受到屈原的特别钟情。在这里，舜和鲧一则屡遭陷害而终于登立为帝，一则治水有功而身遭不测，但无论穷达，二人皆因其功德而为夏、楚人祭祀怀念。因此《天问》第二部分的“舜鲧史”恰如整个第二部分的引子，以一正一反两个例子，揭示出了不管最后遭遇如何，“民德”者将永享长祚的主题。引子之后是主旋律，夏、殷、西周三代兴亡史更是反复阐明了引子中已揭示出的这个主题。

### 三

综观《天问》所叙夏、殷、西周三代史，有三个共同点值得特别注意。这就是：一、三代史开头，都叙述其民族诞生历史，对传说中三代始祖皆负“天命”而生表示怀疑；二、三代史的末尾，都对三代受命于天，可享长祚的说法提出质疑；三、着重指出三代兴亡的原因皆在于得人与失人。

据诸籍所载，禹继舜为天子。但他改变了传说中的禅让制度，而传位于其子启，夏朝由是而发端。因此作为夏朝开始的君主，启的诞生，有丰富的传说。从《天问》所写来看，禹在治水过程中与涂山女野合于台桑，而生下了启。“台桑”，如后来楚之云梦、宋之桑林、亦如简狄吞燕卵之“台”，乃民族的高谋祭祀之地。传说中启孕育于此，不消说，是使他的诞生具有某种神性。因此，启诞生的过程——生自其母的化石——也具有传奇色彩。与此相同，殷的始祖契由其母吞(或怀)燕卵而孕育，周的始祖稷因其母“履大人迹”而孕育，皆不无神性。但是屈原虽然在夏、殷、西周三代史的开头即将这些故事一一摆了出来，却对这种负“天命”而生的说法持强烈的怀疑态度。从诗中不少含有讥刺口吻的质疑，不难体会到这点。如对禹与涂山女野合而生启，他下一个“通”字，且否定禹的“嗜”欲与一般人“不同味”，认为禹的举动无非是饱足男女肉欲的一种普通举动罢了；而启之所以得继“厥身”，也不过是这种“闵妃匹合”的结果，且以其母的“死分竟地”为代价，反对生而神圣之意，溢于言表。再如对“玄鸟致贻”而生契的故事，他怀疑道：“玄鸟遗卵，而简狄为何会生子呢”<sup>[5]</sup>？又如对稷，他也是对稷降生后的神奇遭遇发出了疑问之词。上述这些质疑既是一种否定，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传说和典籍中宣扬的夏、殷、周三代皆受命于天的说法。

上述解释是否我们的一厢情愿呢？且让我们再来看看三代史结尾的部分是怎么说的。

于夏史，他说：“缘鹄饰玉，后帝是飨。何承谋夏桀，终以灭丧。”这四句历来颇有歧解，清曹耀湘《读骚论世》云：“后帝，天帝也……上帝之歆飨也久矣。后嗣有可承之诒谋，何以至桀之时遂灭

其国而丧其身?以见桀有自取覆亡之道,上帝固无私也。”曹说与《天问》全篇旨意吻合,可从。

于殷史,屈原所问更为明确:“授殷天下,其位安施?反成乃亡,其罪伊何!”所谓殷不是由上天授予天下的吗?那么上天对于殷的树立到底又做了些什么呢?结果是反而促成了殷的灭亡,殷到底犯下了些什么罪过呢?屈原的这一连串的问题正与前夏史之末所问如出一辙,亦可证前曹耀湘说之确。

又于西周史,屈原则问得最为明确:“皇天集命,惟何戒之。受礼天下,又使至代之。”谓皇天上帝既赐命于一姓之君,作为人君又该怎样来戒惧,谨慎地对待这种使命呢?(因为)任何君主都是既可以受礼天下,又可以被取而代之啊!这实际上是一种以退为进的说法,看起来表面是承认有“天命”,而实际上既然任何君主、朝代俱可随时被取代,这“天命”不是可有可无了吗?但是采取了这种表面退一步的说法,反而使我们感到诗人更为沉重的叹息声。因此这数句之问并不仅仅具有针对西周数朝的意义,完全可以看成是对夏、殷、西周三代历史兴亡的总束性的发问。

当然,上述夏、殷史结尾部分的发问皆因其明确提到“承谋夏桀”、“授殷天下”,而可以使人毫不怀疑那几句是就夏、殷之亡而发出的叹息。但上引所谓“皇天集命”四句的情形就略有不同了。这四句原本处于“伯林雉经,维其何故。何感天抑坠,夫谁畏惧”与“初汤臣挚,后兹承辅。何卒官汤,尊食宗绪”这两组句子之间。若从前四句,当属春秋史;若从后四句,当属殷史。我们将其单独抽出,缀于西周史之末,根据到底何在呢?通观《天问》全篇,象这样直接从朝代兴亡与上天赐命之间的关系提出的质疑恰巧共四处。如前所述,夏、殷两处似无可怀疑;春秋史开首“天命反侧”二句与齐桓公事相连,似亦无可怀疑。那么“皇天集命”几句不正当归缀于西周史吗?推测之词不足以立论,考察其词源,“皇天集命”的含意与个别关键词正出自咏周之诗。《诗经·大雅·大明》云: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难忱斯,不易维王。天位殷适,使不挾四方。挚仲氏任,自彼殷商,来嫁于周,曰嫔于京。乃及王季,维德之行。大任有身,生此文王。维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怀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国。天监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载,天作之合。在洽之阳,在渭之谿。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大邦有止,倪天之妹。文定厥祥,亲迎于渭。造舟为梁。不显其光。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缵女维莘。长子维行,笃生武王。保右命尔,燹伐大商。殷商之旅,其会如林。矢于牧野,时维予侯兴。上帝临女,无动尔心。牧野洋洋,檀车煌煌。騶骝彭彭。维师尚父,维鹰扬,凉彼武王。肆伐大商,会朝清明。

其所以将《大明》全诗具引于此,是希望无需多加分析,读者自己也会看到《天问》中不少用辞用语,乃至场景都借鉴自《大明》。

对此诗前六句,郑玄笺注云:“明明者,文王、武王施明德于天下,以应征咎晰见于天”;又云:“天之意难信矣。不可改易者,天子也。今纣居天位,而又殷之正适(嫡),以其为恶,乃弃绝之,使教令不行于四方,四方共叛之。是天命无常,维德是予耳。言此者,厚美周也。”对“不易维王”一句郑笺,孔颖达疏则更明白晓畅:“自古以来无不易之代。云‘不可易’者,以诸侯以下,废立由人,是其可改易也。至于天子之位,则非人力之所能变改。言‘不可改易’,所以见其难。难而能改,所以美周德也。”

郑、孔二氏俱看出《大明》一诗有强调君位之易,在于人君德行的一面,故笺疏皆能得其旨。或屈原亦早已瞩目此点,故能于写《天问》中殷、西周史实时,信手拈来,借鉴其词。只是郑玄将“天位殷适”讲成“纣居天位,而又殷之正适(嫡)”似略嫌适曲。“位”、“立”古同用,《管子·心术上》“位者,谓其所立”是其证。那么“天位殷适,使不挾四方”当释为:上天虽树立了殷嫡,却使他不能统治

四方。《天问》中“授殷天下，其位(立)安施”之语就正承袭自《大明》。所不同的只是，《大明》以叙述句型所陈述的事实，被《天问》以疑问句型的方式加以质疑，因而更容易引起读者对历史教训的深刻思考。此外，《大明》一诗着力描写了周武王继承父业，受天之命，取殷而代之的史实。而有趣的是，《天问》写殷史的最后一段，自“会朝争盟”以下，一些用辞、场景的描写都可以看出，也是借鉴自《大明》一诗的最后一章的。

明白了这些，我们当可以相信，《天问》“皇天集命”以下四句正当出自《大明》一诗了。不过二者所不同的是《大明》的作者不止一次地申明：“天监在下，有命既集”；“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上帝临女”等等，那种周乃受天命而生的当之无愧的自负，洋溢于字里行间，使人时时有所感受。而在《天问》中屈原却回顾了西周所遭受的一连串挫折和动乱，以至不得不迁都、衰落的情形，而借鉴了《大明》上述句子，对周的国祚能否长久发出了令人深省的质疑。掩卷而思，使人处处得闻屈原沉痛的历史叹息。从思想史的角度看，《大明》的作者虽然站在以周叛殷的角度，强调了君位易移，在于人君德行，但却又处处将这种“德行”置于“天”、“上帝”的肯定之下，乃是以承认“天命”为前提的一种二元论；而屈原虽然也说，“皇天集命”，但正如前所述，他强调的，唯一看重的却是人君的品格德行，以至于最后能说出“天命反侧”这样的话。因此《天问》虽然借鉴了《大明》，却较《大明》更为进步了。

以上既已辨明夏、殷、西周三代史结尾部分都有着总结性的，对三代受命于天，可享长祚的质疑，我们还可附带注意到夏、殷二史结尾处的一致：夏史之末问道：“何条放致罚，而黎服大说”；殷史之末乃云：“争遣伐器，何以行之。并驱击翼，何以将之。”王逸《楚辞章句》于夏史句云：“言汤行天之罚，以诛于桀，放之鸣条之野，天下众人大喜悦也”；于殷史句则云：“言武王三军，人人乐战，并载驱载驰，赴敌争先，前歌后舞，鬼藻欢呼，奋击其翼，独何以将率之也？”二释皆得其旨。由是，我们再联系二史结尾处言及天命之句来看，则屈原的意思更为显豁。可以这样综合其语来浅释其旨意：不是说受天之命吗？何以最后又遭到灭亡的命运呢？而且灭亡之时，竟是如此皆大欢喜，人人出力？当然，周朝在《天问》写作之际尚未完结，屈原自然不可能给它设想一种具体的灭亡情节而仅止于警告而已。因此，我们更可以深深地品味“皇天集命，惟何戒之”几句的深刻涵意了。

#### 四

以上既探讨过三代史中共同的开头和结尾，已知屈原对“天命”所持态度，即三代之兴亡，绝不取决于“天命”。那么在屈原看来，三代兴亡的关键何在呢？这就是得人与失人。

在《天问》中，三代史都叙述了各自的兴起，这就是夏史中的“启代益作后”；殷史中的“成汤东巡”；西周史中的伯昌“命有殷国”。用人得贤，因而兴起的用意，在殷、西周二史中皆可一目了然。殷史以相当大的篇幅就汤之得伊尹的故事作了记载。从某些屈赋独有而不见诸其他典籍的细节，如“尊食宗绪”等来看，可知当时汤对伊尹的重视达到极点，以至最后伊尹得配享商之宗庙。西周史则以“师望在肆，昌何识”等四句，讲述了文王得吕望相助的故事。

那么在《天问》的夏史中，是否也有这样的内容呢？《天问》中没有明言夏史中的任贤，但从其中记载的故事情节看，对启的得人，是给予了充分强调的。启与益在夏的开国时有过一段相争甚至攻伐的历史，已为诸多先秦两汉间典籍所载，不存在疑问。所不同的，是诸书对这一事件的具体

情节的记录和评价存在着一些分歧。但是综览诸书，以下说法似较有代表性：《古本竹书纪年》云：“益干启位，启杀之”。《孟子·万章上》云：“益干启位，启杀之”。《孟子·万章上》云：“万章问曰：‘人有言，至于禹而德衰，不传于贤而传于子。有诸？’孟子曰：‘否！不然也……禹荐益于天，七年，禹崩。三年之丧毕，益避禹之子于箕山之阴。朝观讼狱者不之益而之启，曰：吾君之子也。讴歌者不讴歌益而讴歌启，曰：吾君之子也。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尧，禹之相舜也，历年多，施泽于民久。启贤，能敬承继禹之道。益之相禹也，历年少，施泽于民未久’。”《韩非子·外储说》云：“禹爱益，而任天下于益。已而以启人为吏。及老，而以启为不足任天下，故传天下于益，而势重尽在启也。已而启与友党攻益而夺之天下。”另外一个与启发生争执的是有扈。《吕氏春秋·先己》从《尚书·甘誓》之说云：“夏后伯启与有扈战于甘泽而不胜。亦卿请复之。夏后伯启曰：‘不可。吾地不浅，吾民不寡。战而不胜，是吾德薄而教不善也。’于是乎处不重席，食不贰味，琴瑟不张，钟鼓不修，子女不饰，亲亲长长，尊贤使能，期年而有扈氏服。”

从上述这些材料中，不难看出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启在其登位前后，有着相当多的人拥护，因而才在与益、有扈的斗争中都取得了胜利。《天问》说启“卒然离鬻”，当即指《古本竹书》所云“益干启位”，谓启因此猝然遭灾；《天问》说启“能拘是达”，即谓启能从益的拘制中逃出；而《天问》说“皆归射籍，无害厥躬”，则“言益之兵徒与启战时，皆授其兵器于启而溃，启因得胜，故曰无害厥躬。犹史称纣师虽众，皆无战之心，欲武王亟入，皆倒兵以战也”<sup>[6]</sup>。正是由于斗争过程如此，故屈原在这一段叙事之末问道：“何后益作（祚）革，而禹播降”，即为何益之地位最终不保而禹之后嗣绵绵不绝（“播降”为“蕃隆”之借字）呢？字里行间，强调了启得人而致胜的道理。

综上所述，三代之所以兴，皆因得人，而非“天命”之故也。那么三代之所以亡呢？

于夏史《天问》乃历数了羿、浞、浇、桀等，其人或以荒淫逸游，或耽于女色，故亡国破家，命运短促。

于殷史，《天问》则着重以纣之不用贤人而任“谗谄”与汤之任贤对比，历数了纣对比干、梅伯、箕子和雷开等人颠倒黑白的待遇，指出了殷亡的历史原因。

于西周史，《天问》则又历数了昭、穆、幽王等的荒政行为，其指责所向，恰可与夏史中的批评等量齐观。

总之，三代之所亡亦与其所兴同一道理，皆非“天命”而在于是否能实行贤人政治，明君政治。

我们既已阐明《天问》所述夏、殷、西周三代史开首、结尾与中间所具有的三个共同点，当不难得出结论，作为《天问》第二部分的主体的三代史所包孕的主题，乃是与这个部分的引子舜鲧史所传达的思想完全一致的。据此，我们再看看这个部分的春秋史一段，其中言齐桓公“卒然身杀”；言晋申生之“雉经”；言吴国阖庐之能“壮武厉”，“流厥严”（谓流布其威严），都仍然是类似前面的强调得人兴，失人亡的写法。具体的史实，读者自参《左传》僖公十七年、《史记·齐太公世家》；又《左传》庄公二十八年、僖公四年、五年；又《左传》昭公三十年、三十一年、定公四年诸文可也，不烦在此一一例举了。

通过上述这些探讨。现在我们更可以深切地感受到了，整个《天问》的结尾，更是从楚国春秋以来的史实出发，对现实发出的深深的忧虑之言：“荆勋作师”四句，乃以楚庄王接受贤臣进谏“悟过改更，且任用贤臣孙叔敖，遂成霸业之事，告诫楚顷襄王须戒除淫泆之习；“吴光争国”二句，则以楚平王时荒淫无道，又任用谗人费无极，陷害忠良，杀伍奢与伍宛，迫使伍子胥，伯嚭等逃奔于吴，造成楚被吴攻破郢都的惨痛历史教训，指出荒淫无道，任用谗陷之人的必然后果；“是淫是荡，

爰出子文”与“试(弑)上自予,忠名弥彰”则在前面楚庄王、楚平王得失的历史教训之后,更以子文、子兰二位令尹相较,指出用贤臣则必兴,用佞臣则必将似“堵敖”之“不长”<sup>[7]</sup>。

千溪万流,终归大海。从开天辟地,到历史烽烟,诗人的心终究是执着于楚国现实政治的。在当时,《天问》乃是一首有着极强的政治功利目的政治抒情诗。

以上我们就《天问》的写作意图和作者的思想脉络作了一个大致的探寻。不言而喻,这种探索是粗线条的,它回避了很多具体的训诂、校勘等方面的问题。但是我们认为,对于任何一部古代文学作品而言,任何时候,具体的训诂和校勘都不能离开作家的思想实际。尤其是当训诂与校勘歧义丛生,莫衷一是之时,从作家的思想出发去考察和分析作品的真谛就尤为紧要了。即以《天问》为例,其中几乎全是问句的形式写的。这些问句多以“何”为疑问词。众所周知,这个词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中可以表示“哪里”、“哪个”、“什么”、“怎么”等等意思,需要根据语境做出恰当的解释。而《天问》几乎一句一问,恰恰没有提供这样的语言环境,如若不根据屈原在整个屈赋中所表现出来的一贯的思想,我们将依据什么为准绳来释读《天问》中这些问句呢?

或许有人会责怪我们打乱了作品原有的顺序,会怀疑象我们这样读《天问》是否符合《天问》的原意。诚然,原来顺序的打乱,是会影响对作品思想和个性,对文学韵味的欣赏的。但是我们在这个分析过程中却始终遵循着不破坏一个个具体故事或故事因素,不破坏历史人物之间的关系的原则,在这样的前提下来探讨屈原对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或许亦不乏启发性。

或许还会有人问:《天问》的第一部分百余句仅及于天文、地理、自然,而并不问人事,这部分从写作宗旨上看,与屈原的反“天命”,强调“明君政治”、“贤人政治”又有何关系呢?答曰:只要对屈原思想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屈原的思想虽然融合了诸子百家的多种思想成分,但是儒、法两家思想在其思想中仍然是占着举足轻重的主导地位的。《天问》第一部分专及于自然,从诗歌结构的角度而言,从开天辟地叙述而来,本是历史题材类型诗歌的题中应有之义,中外史诗类诗歌莫不如此。但是从屈原的写作旨意上言,却不能不受其儒、法思想重人事,轻天命鬼神特点的制约,恰如孔子所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论语·先进》);“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因此在《天问》的这个第一部分中,屈原之问颇带着一些不可知,不必知,也不需知的色彩。他强调的,正是后面两个部分的“人事”。这不恰恰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天问》的问旨,乃在于对“天命”的强烈怀疑乃至否定,对其“美政”思想的再次强调和肯定吗!

#### 注释:

[1]以每一逗为一句算。

[2]又参汤炳正师《屈赋新探·民德计极天命观》,齐鲁书社1984年版。

[3]“女媧”当即舜之女弟“女嫫”的字误,参汤炳正师《楚辞类稿》,巴蜀书社1988年版。

[4]参拙著《论屈赋神话传说的非历史化》,载《楚辞研究》,齐鲁书社1988年版。

[5]参汤炳正师《楚辞类稿》。同前引。

[6]参游国恩先生《天问纂义》。中华书局1982年版。

[7]以上详参汤炳正师《楚辞类稿》。同前引。